

文學女性主義重建男性經驗與男性形象的政治策略

劉群偉(荒林)*

摘要：伴隨著「中國崛起」過程，以反思姿態介入男性支配氣質建構，文學女性主義重建男性經驗和男性形象的政治策略，試圖還原男性現代生存真相，充分關注男性中那些「沈默的、缺席的、沒有說出的、符碼化的，有可能是他自己失落的一部分。」採用了如下幾項文本政治策略：一是對男性失敗經驗的書寫；二是對男性弱勢經驗的書寫；三是重建男性主體形象；四是關注女性和男性的對話。論文以龍應台《大江大海》、虹影《饑餓的女兒》、張潔《無字》與嚴歌苓《媽閣是座城》等重要文本的男性書寫分析來展示大中華語境文學女性主義男性關懷的多重努力。

關鍵詞：對男性失敗經驗的書寫；對男性弱勢經驗的書寫；重建男性主體形象及女性和男性的對話

一. 有關當前女性主義研究中的男性與政治問題

西方女性主義自 20 世紀 80 年代，將性別研究由關注女性和爭取女性與男性同等的權利，推進到關注男性和男性研究領域，研究父權菲勒斯中心主義對男性的影響，剖析以少數人的成功和多數人的犧牲為代價的父權體制對男性的傷害，推動對父權體制的深層改革。目前男性氣質研究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性別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視角幾乎涉及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領域，甚至包括生物科學和自然學科。那些認為男性氣質由生物決定的觀點，如男性更進取、競爭、好鬥、暴力；如男人的行動由左腦控制，女人受右腦控制，左右腦有不同；再比如，男人的精子即呈現激烈競爭。如此等等的觀點，曾經被認為是男性優越論所建立的生物學基礎，如今已被性別是社會建構的理論所取代。¹

當代西方最著名的男性研究專家和男性氣質改變實踐家康奈爾，他通過親身實踐和深入田野調查，提出男性氣概是在實踐中建構的，指出並沒有天生的、生物決定的性別，在人類社會中性別是社會建構的。他本人在實踐中將自己的男性氣概重建為女性氣質，在社會公共空間和研究領域，他都把自己的社會性別定義為女性，他在填寫性別表格時一律採用「女」和「她」，因此研究者們也把他的理論直接寫成她的理論。² 這位

* 劉群偉(荒林)，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1. 方剛：〈當代西方男性氣質理論概述〉，《國外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2. 方剛：〈康奈爾和她的社會性別理論評述〉，《婦女研究論叢》，2008年第3期。

美國學者的理論和實踐行動的知行合一，體現了父權菲勒斯中心主義「男性氣概」和男性氣質的可改變事實。吉登斯評價康奈爾：「他的理論在社會學界特別有影響，因為他把父權制和男性氣質概念結合為一個性別關係的綜合理論。在康奈爾看來，男性氣質是性別秩序的重要部分，不能同性別秩序或者同與之相伴的女性氣質分開理解」。³

康奈爾的理論認為：從支配性男性氣質「男性氣概」中，可以分析出權力在實踐過程中的作用，是三個互相影響的社會層面建構了男性氣質。其一是性別權力關係，在當代歐洲、美國的性別秩序中，權力關係的主軸是女性的整體從屬性地位與男性的統治，這一結構也就是婦女解放運動所要挑戰的父權制；其二是生產關係，性別分工差異是常見的，通過對工作的性別分工，資本主義經濟積累著性別的差異，結果是男人控制財富，而財富的積累又通過性別的社會關係緊緊地與生產領域聯繫在一起，使社會呈現為男人主導生產，男人統治管理；其三是情感關係，在這一形塑和實現性欲望的實踐活動中，雙方是自願的還是強迫的？快樂是平等地給予和接受的嗎？實際上性別秩序會參與情感關係實踐。基於以上三個社會建構層面分析，康奈爾認為男性氣質之間存在著等級。他將男性氣質劃分為支配性、從屬性、共謀性、邊緣性四類，它們共同建構現代西方性別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氣質模式的種種實踐和關係。具體而言，支配性男性氣質被認為是男性氣質的「理想類型」，一個集團可以憑藉支配性男性氣質來聲稱和擁有在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而被統治男人處於從屬的地位。由於能夠從各方面嚴格實踐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男性是相當少的，於是需要從女性的整體依附中獲得共謀性。而邊緣性指那些階級和種族中發展出來的男性關係，如富有的黑人男明星與白種男人富人之間的關係。男性氣質的四種類型處於動態實踐，並受到女性主義改造的挑戰。⁴

康奈爾的理論有助我們理解西方父權對東方的擴張，其支配性男性氣質將東方女性化的過程，也試圖將東方男性變成從屬性、邊緣性，甚至共謀性男性氣質，以便建立西方主導的統治秩序。在西方現代性競爭推進中，東方男性原有的秩序系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原來的歷史進程被迫中斷和轉型，抵抗西方男性支配性氣質，重建自身的男性主體形象的努力，可說充滿了後發現代性進程。在「亞洲崛起」和「中國崛起」的主流表述背後，充滿了東方現代男性經驗的複雜性，和男性主體形象於破與立之間，複雜權力實踐的張力場域。

大中華語境的文學女性主義用文學的方式關注和研究東方男性的現代性處境，幾乎與西方女性主義轉向男性研究同步。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大陸中國開放不久，被稱為大陸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女權之作《在同一地平線上》⁵ 已出現對中國男性支配性氣質重建的關注，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以畫強悍的老虎為追求，並強烈要求妻子服從於他的事

3. 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

4. 陳曉明：〈勉強的解放：後新時期女性小說概論〉，《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3期。陳曉明教授認為，「也許張辛欣是新時期最早具有女權意識的作家，這個自發的女權主義念頭只能一閃而過。她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把視點對準男女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第一次被放置在性別文化的背景上來表現」。

5. 宋素鳳：《多重主體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頁。

業。老虎作為男性氣概的象徵，和雄獅通常用來象徵東方雄性力量相類似。這篇小說對男主人公身形、氣質與追求的「虎氣」描述，象徵了大陸開放之初的男性支配性氣質張揚。女主人公對男主人公男性支配氣質的反思，則象徵了文學女性主義對男性主體建構的參與。

伴隨著「中國崛起」過程，以反思姿態介入男性支配氣質建構，文學女性主義重建男性經驗和男性形象的政治策略，試圖還原男性現代生存真相，充分關注男性中那些「『沉默的、缺席的、沒有說出的、符碼化的』有可能是他自己失落的一部分。」⁶採用了如下幾項文本政治策略：一是對男性失敗經驗的書寫；二是對男性弱勢經驗的書寫；三是重建男性主體形象；四是關注女性和男性的對話。本文以龍應台《大江大海》、虹影《饑餓的女兒》、張潔《無字》與嚴歌苓《媽閣是座城》⁷等重要文本的男性書寫分析，來展示大中華語境文學女性主義男性關懷的多重努力。

二. 對男性失敗經驗的書寫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曝屍於溝壑。時代的鐵輪，輾過他們的身軀。那烽火倖存的，一生動盪，萬裡飄零。

……

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那麼，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龍應台用「他們被帶往戰場」的被動句式，將男性中的被支配群體命運凸現在我們眼前，他們的死傷飄零，是對戰爭中男性失敗者形象的概括。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

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龍應台站在失敗者一方的立場，使自己觀察和訴說以真實填補沉默男性群體的經驗。2009年龍應台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簡稱《大江大海》），是大中華語境文學女性主義貢獻的一部書寫男性失敗經驗的開拓之作。這部力作不僅以國共內戰為題材，而且囊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內容，全書是對現代父權擴張導致的世界性戰爭的全面、深刻的反思，是大中華語境文學女性主義對「父權制不只是男人支配女人，尚且包括男人之間的軍事主義階層制」⁸進行深刻剖析之作。

6.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初版）；虹影：《饑餓的女兒》（臺北：爾雅出版社，1997年5月中文初版）；張潔：《無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第1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1次出版），第1、2、3卷；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初版）。

7.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1年4月第12版），前言，第3頁。

8. (美)米利特(Kate Millett)，宋文偉、張慧芝譯：《性政治》（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序，第5頁。

1. 文學女性主義的反戰立場

全書分為8部73個故事，體例即呈現出鮮明的文學女性主義特徵：龍應台花了一年多時間尋訪戰爭親歷者，文本由親歷者的口述和歷史照片構成。在此，文學行動不僅是作者的行動，更是作者所調動的親歷者共同進入回顧和反思戰爭的文學行動，同時，龍應台對19歲正值服役年齡的兒子飛力普，展開了母親娓娓的對話，把親歷者口述歷史場景拼貼為戰爭的空間地圖，以母親向兒子展示往事的方式，把女性主義對男性命運的溫情關懷滲透于文本。事實上，這本書的結尾正是女性主義的反戰宣言：

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是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樣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⁹

龍應台這一把家國、正義非正義尺度置之度外的立場，顯然繼承了英國女權主義者佛吉尼亞·伍爾夫著名的反戰觀點「女人沒有祖國，女人不需要祖國，她的祖國就是整個世界」，¹⁰但她卻並沒有採取伍爾夫做戰爭「局外人」的立場。¹¹伍爾夫身處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她預感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在精神崩潰前夕自殺，這使她事實上來不及反思戰爭後果，來不及對男性本身所受戰爭傷害進行剖析。龍應台出生於戰爭離亂年代，父母飽受戰爭流離之苦，她亦曾在二戰的失敗者德國生活十多年，兒子是中德混血兒，正是兒子面臨去服兵役的現實，使她無法以「局外人」的立場回顧戰爭。不做「局外人」，而做一個戰爭廢墟的記錄者、清理者和泣血的反思講述者，使龍應台的女性主義深具文學感染力，也使文學女性主義政治力道有如柔道一般擊中父權體制最強壁壘軍事統治。正如臺灣學者孫瑞穗指出：

不管頭盔或臂章上註冊的到底是「中華民國軍人」，「日皇護衛隊」，還是「臺灣原住民」，不論「祖國」何屬，總之，他們年紀輕輕就被犧牲了。那樣純潔而熱情的屍體白白地被隨便丟棄在路旁，在廣場上堆疊如山，無人聞問，然而，卻成了我們今天進行歷史反思時最不可承受的重量。¹²

《大江大海》出版一年半時，在台港銷量已達四十萬冊，在禁止發行的大陸，中南海人手一冊，¹³之後一直持續再版，形成「江海現象」。由於題材涉及敏感的國共內戰歷史，圍繞內戰歷史的立場各不相同，爭議不斷發生。大陸歷史學家高華認為，龍應台將自己的研究與人性關切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對1949年的歷

9.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4月第12版），第438頁。

10. (英)佛吉尼亞·伍爾夫：《三個金幣》，《伍爾夫隨筆全集》第四卷（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頁。

11. 同上，第1182頁。

12. 孫瑞穗：《失敗者的共同體想像：回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思想》季刊第13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10月）。

13. 陳一姍、龍應台：《一把溫柔的鑰匙》，陳一姍採訪整理：（臺北：《天下雜誌》第466期，2011年2月23日）。

史作出反思，在大陸和臺灣都是第一人，並指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複雜，場面宏大，從1949年200萬大陸人渡海遷台，再到二戰時期的德、俄戰場和南太平洋戰場，從「白色恐怖」對「外省人」的殘酷迫害，到「本省人」對「祖國軍」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全書有家有國，以個人和家族的變遷，來折射時代和國家的大勢走向對個人命運的影響。作為歷史學家，高華還特別指出，這是部用散文的文體，以新的思維對1949年前往臺灣的一群中國人進行全新論述的重要作品。在書中，龍應台滿懷溫情地寫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萬苦、萬里漂泊到臺灣的故事，也寫了一系列當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離鄉、生離死別、逃難、跨海、落地生根於臺灣的故事。過去人們只知道國民黨政權1949年被中共打敗，被迫退往臺島，今天龍應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現1949年庶民渡海遷臺的畫卷，裡面由無數的個人和家庭組成，結合起來，就成了一部罕見的中國近代「南渡」史。¹⁴

與高華觀點迥然不同，臺灣作家李敖於《大江大海》出版兩年之際，推出了《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¹⁵ 他採用了一些他熟悉的歷史資料，對龍應台書中寫到的一些史實進行質疑，比如長春圍城，龍應台寫到打死和餓死的人數相當南京大屠殺數字，李敖則提供了新的資料，指出國民黨錯誤死守和決策上的「餓民戰術」導致慘敗。李敖從諸多史料證明國民黨的錯誤，並認為龍應台試圖以文學形式延伸蔣介石的思想，他要堅決顛覆「大江大海」的觀點，反對龍應台為國民黨說話，他質問：「1949哪來的大江大海？」¹⁶

高華和李敖的褒貶，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讀者對《大江大海》的看法，但這些不同的觀點卻有一個共同的性別視野的缺失，正是這一缺失，使得他們都沒有看到龍應台對黨國立場的超離。如前所述，文學女性主義的立場才是《大江大海》新的思維所在，女性主義的反戰傳統和人性關懷，使龍應台注重個人經驗的歷史價值，她在採訪中記錄史實資料的同時，更偏重記錄人物的感受和心情，文本是沈浸於感覺的文本，不是枯燥的資料，更不是冷冰冰的死亡數字。復活每一位親歷者的生命歷史，讓生命訴說失敗的痛苦，才是《大江大海》撼動人心的「江海現象」所在。龍應台在12版篇首語《湧動》中寫道：「2009年秋天，出版，好像有一道上了鎖，生了鐵銹的厚重水門，突然之間打開了，門後沉沉鬱鬱的六十年記憶之水，『嘩』一下奔騰沖瀉而出，竟然全是活水。」¹⁷

這活水可說是男性壓抑於歷史深處，不為人知的戰爭和失敗經驗「浮出歷史地表」。古往今來，「一戰功成萬骨枯」，彪炳史冊的都是成功者，而成功者從來是極少數男性，那些大多數的傷亡者，他們的生命體驗和內心世界，從未被從男性生命史角度進行過觀照。《大江大海》借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史實，將尚倖存的失敗者口述記錄

14. 高華：《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思想》季刊第15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年5月）。

15. 李敖：《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臺北：臺灣李敖出版社，2011年版）。

16. 李敖：《李敖揭批龍應台：1949哪來的大江大海？》（北京：《文史參考》2011年第9期）。

17.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初版，2011年4月第12版），前言，第7頁。

於案，它所折射的卻是全部父權戰爭史的真相。就像女性「浮出歷史地表」，她們中的個人個案，折射著女性全部歷史命運一樣。正由於每一位口述者可以真誠訴說自己內心的恐懼、憂傷、壓抑、等待和痛苦，口述帶來了強烈的反響，帶來了全球範圍「離散譜系」的尋找。

2011年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龍應台再一次鮮明地表達了她超離黨國立場的女性主義姿態和男性關懷情懷：

《大江大海》是無法同時照顧「大是大非」的，在這個意義上，是的，我是個沒有「是非」的人。……

如果我來到這個荒蕪戰場的初衷和用心，是為六十年前戰死的白骨上一炷香，給仍在看不見的地方受傷流血的人敷藥、包紮，你想我對於你為何失敗、為何勝利這種問題，會有興趣嗎？對這種問題有興趣，而且比我有能力去處理這種問題的人，太多了吧？

不論江湖浪多高，最後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的，還是自己最樸素的初衷吧。¹⁸

2. 男性失敗經驗的書寫與反思

《大江大海》從戰爭離亂開筆，龍應台的24歲懷抱嬰兒的母親美君，茫然無知中逃離家鄉，在臺灣六十年，無法遺忘家鄉新安江的水，那是她與自然的紐帶，因戰爭而割裂了。她的兒子離散在大陸衡陽，六十年後，在臺灣出生的龍應台回大陸找哥哥，在車站人群中，憑一雙和母親美君相似的眼睛兄妹相認。軍人父親槐生，一生只會唱帶著家鄉湖南口音的戲曲，唱戲聽戲都會眼淚直流。

《大江大海》凝集了70多個類似作者個人家庭離散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實際經過了作者周密安排，能夠有序呈現戰爭導致的男性失敗經驗，作者陳列這些失敗經驗的目的，不是要譴責男性，而是要揭示它們帶給男性和人類的創傷，作者的反思串起了這些經驗，使得最終表達的反戰思想鏗鏘有力。

在表達政治策略上，體現文學女性主義的空間政治，全書採用對話空框結構，作為母親的龍應台一直與面臨兵役的19歲兒子飛力普進行母子對話，70多個故事分為對話的8個部分，包含著母親對兒子家史、戰爭史循循的講述，更包含著母親對與兒子相同和相近年齡的所有戰爭參與者們的深切關懷，她的講述情感傾向上，是把參與戰爭的年輕人都當成與自己的兒子一樣，尚不懂得戰爭殘酷、還不明白父權軍事體制嚴酷，卻已被捲入和犧牲於冷酷戰爭之中的年輕生命。因此，文本的潛對話者，是廣大的讀者，是要讓讀者一起參與反思戰爭，剖析戰爭失敗經驗導致年輕男性生命犧牲，與之相關的家庭破碎、文化中斷、自然割裂、愛情殤傷、心靈扭曲，誠如高華所發現，在此意義上《大江大海》充滿了全新的論述。事實上，這一全新論述便是文學女性主義的反戰思想論述。前五個部分主要書寫戰爭導致失敗經驗方方面面，第六和第七部分揭示父權軍事體

18. 龍應台，陳一姍採訪整理：《一把溫柔的鑰匙》（臺北：《天下雜誌》第466期2011年2月23日）。

制的暴力特徵，證明失敗經驗是由這一體制製造。第八部分強調戰爭無勝利可言，其暴力本質就是不斷製造各種失敗經驗。

在作者看來，戰爭沒有勝負，戰爭就是失敗，發動戰爭就是父權導致全體人類體驗文明的失敗。這一總的觀點貫徹全書，失敗的經驗書寫則各部分側重不同。具體對話的第一部分〈在這裡，我鬆開了你的手〉，通過描述家族離散歷史的13個小故事，如同13幅細描，展示戰爭使人與人離散的悲淒場景，凸現人在逃亡中死傷無定、喪魂落魄的失敗經驗；第二部分〈江流有聲，斷岸千尺〉講述文明遭遇戰爭而離散的悲慘遭遇，學校轉移、學生傷亡，教師在維持經典誦讀中唯恐文明斷根，智者於困境中辦學。第三部分〈在一張地圖上，和你一起長大〉講述戰爭如何製造敵我關係，使年輕人善良友愛的感情慘遭失敗的經驗。將人類劃分出敵我，要消滅敵人，正是一切戰爭的理由。在這些故事中，敵人卻就是童年的好友。戰爭的荒謬無恥令人性經驗扭曲。第四部分〈脫下了軍衣，是一個良善的國民〉，作者把列寧格勒圍城戰和長春圍城戰，放在同一部分並列講述，一個是德國人對俄國人的戰爭，一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內戰，同樣的慘烈駭人，餓死人吃人的經驗如此驚人雷同。而不論圍城還是被圍城的軍人，脫下了軍衣，都是一個良善的國民。可見正是戰爭使良人變成了惡鬼。戰爭製造了人性失敗的經驗。第五部分〈我磨破了的草鞋〉，集中講述軍人們艱苦的軍旅生活和死亡的經驗，他們本應該是大學生，在學習知識的最好年齡，卻因為戰爭而亡命奔波，有人陣亡、有人在軍旅途中死亡，帶著尚未實現的各自的心願，充滿遺憾離開了世界；那些活下來的幸運者，往事不堪回首。

如果說以上五部分講述了失敗經驗的方方面面：人的離散、文明的創傷、情誼的破碎、人性的淪喪、生命的死亡，那麼第六部分〈福爾摩沙的少年〉和第七部分〈誰丟了他的兵籍牌〉，就是對以上失敗經驗來源的揭露，通過對比和互補的講述，讓讀者看到父權軍事體制如何實現對於男性的暴力統治，如何支配年少的男人們進入被支配處境。〈福爾摩沙的少年〉講述徵兵，少年們多為農家孩子，有的還在中學讀書，他們並不知徵兵之後意味戰爭，更無知於戰爭的殘酷。15、16、17的少年，他們入伍即奔赴死亡等候的戰場！年少、物質匱乏、精神尚不獨立，這一切使他們受到軍車、軍裝和徵兵通告的吸引，他們甚至滿懷喜悅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和親人，直到戰爭的殘酷令他們清醒，然而一切為時已晚。〈誰丟了他的兵籍牌〉寫對戰爭俘虜的處置，作者陳列了戰爭史料，那殺人滅跡的軍事命令，讀來心驚肉跳。作者難以自禁地對兒子飛力普說：「我老想到那個喊救命反而被臺灣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國男孩——他會不會也跟比爾一樣，謊報十八歲，其實只有十五歲？或者，和我的飛力普一樣，十九歲？」作者還寫了一名叫田村的日本兵流落在澳洲特工手中的日記，這位年少的田村愛好文藝，尚沒有戀愛過，內心暗戀一位日本女孩還來不及表白，他寫給女孩的信，永遠沒能寄出。

龍應台用她的史料和講述論證，不論哪國的少年，不論參與戰爭的哪一方，他們都心懷良善和愛情，滿懷生活憧憬和情趣，他們都是人同此心的人類孩子，然而，這些年輕的男孩子們卻自始至終受到父權軍事體制的支配，這一體制異化了他們生命，他們的

生命和內心從未獲得關懷，他們失敗的命運，從進入軍事體制那一刻就注定。《大江大海》為他們而寫：

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癒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¹⁹

《大江大海》發展了伍爾夫開創的女性主義反戰思想，貢獻了大中華語境文學女性主義對男性關懷最深切的聲音，它不僅是為失敗的、無聲的男性而寫，也是為新一代男性而寫。「我開始思索：歷史走到了二〇〇九年，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那麼青春那麼無邪的人，我要怎樣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²⁰

《大江大海》的性政治，是對飛力普和他的同代男性，講述自由與和平的女性主義理想，倡導大多數男性的覺醒與反思，倡導反對少數父權支配者對男性和人類發動戰爭。在此高度，國內戰和世界大戰都被置於作者的反思視野，也因此，超離國共立場閱讀本書，才能獲得對於大中華文學女性主義貢獻的深刻認知。換言之，反思內戰和世界大戰，女性主義立場相比其他立場，因具男性關懷視野，它所呈現的男性失敗經驗，無疑是人類反思現代性的重要依據。未來學家和女性主義學者理安·艾斯勒指出，現代科技和父權統治關係相結合，就會把人類帶向死亡的深淵，但人類可以選擇一個更可持續、更平等、和平的夥伴關係的世界，夥伴關係的世界是一個男女平等、更多的男性不受少數男性所支配的合作世界，更多的男性和女性有機會體驗人性的成長，不必受到戰爭的傷害。²¹《大江大海》對失敗的總結與和平的珍惜，體現的正是這一理想。

三. 對男性弱勢經驗的書寫

如果說父權及其象徵體系把失敗男性經驗壓抑於歷史地表之下，那麼對於男性弱勢經驗的書寫同樣諱莫如深。圍繞塑造支配性男性形象的需要，強勢男性經驗籠罩了主流話語。然而，軍事暴力可以消滅失敗男性，日常生活卻無法讓弱勢男性都淹沒。相反，正是日常生活中充滿了真實的、與女性相似的男性，他們的人生經驗，他們與女性一樣受到父權支配的命運，體現了大多數男性生活的真相。儘管男性從小接受男性支配性氣質教育，認同支配成為大多數男性的性別取向，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以支配女性和接受更強勢男性的支配，來實現作為男性身份的社會認同，但這一認同過程，如同澳大利亞男性研究專家史蒂夫·比達爾夫指出：他們「孤獨、迫於無奈的競爭、伴隨著終生的情感怯懦」，他們感受到做男人的孤立。²² 因此，現實中有不少男性從自身處境發出情同此身的領悟，放棄對女性的壓迫性支配，能夠在生活中與女性平等相處，在給予女性生命關懷和理解的同時，贏得女性的尊重和愛情。文學女性主義充分注意並著意開掘男性弱

19.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4月第12版），第437頁。

20.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4月第12版），第26頁。

21. (美)理安·艾斯勒，程志民譯：《聖杯與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總序，第1-2頁。

22. (澳大利亞)史蒂夫·比達爾夫，石新輝譯：《男性的品格》（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

勢經驗的書寫，從女性主義政治策略而言，不僅是爭取大多數男性對女性的理解，而且是女性主義對男性的關懷，以雙性平等的理想，實現人類有愛的生活。

英籍華文女作家虹影，寫作了大量自傳體小說，其代表作《饑餓的女兒》，題材涉及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發生在大陸中國的大饑餓史實，小說以作家個人的遭遇和家庭遭遇，再現饑餓苦難，講述饑餓中男女相愛生下私生女並由養父撫養成人的故事，其英譯本和漢語本都深受不同語言讀者歡迎，產生了世界性影響。小說的文本政治特徵是，圍繞私生女的誕生和成長，生父和養父與母親一起歷經磨難，形成一道無形的愛的聯盟，他們共同創造了私生女長大成人的奇跡，正是這一奇跡控訴了操控人們命運並製造饑餓的支配性父權力量。文本對弱勢男性經驗的書寫，再現了底層男性生活真實，塑造了充滿隱忍精神和愛的努力的男性形象，使小說富於感染力。

在文本中，饑餓的女兒包含三重象徵，她象徵了物質生活的匱乏、精神生活的荒蕪和私生女身份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如果說物質生活的匱乏和精神生活的荒蕪是當時普遍的社會現實，私生女問題卻是非常獨特的困境，事實上，私生女情結是一個深含性別秘密的話題。在父權社會之前，母親生的任何孩子都是親生的、平等的，無須說明父親是誰，父權中心婚姻制度確立之後，母親生育了父親之外其他男人的孩子變成非法，出現了私生子或者私生女這樣的概念。因此，私生女問題與婚姻法聯繫在一起，小說中，這個私生女尚在襁褓中，就被帶到法庭，在不同的男人和母親的手上扔來扔去。幸而婚姻中的男人非常善良，就在女嬰被扔來扔去的過程，他改變了主意，由於他是起訴方，他的改變也帶來了女嬰命運的好轉。關於小說中男性弱勢經驗的書寫，正是立足於父權婚姻遭遇私生女考驗的背景。

養父，婚姻中的男人，他迫於生計航船在外，家中一群孩子全靠妻子負擔。在全民饑餓的時代，養父的工資正常也不能使家人溫飽，不幸他受傷住院，連家都不能回。母親，婚姻中的女人，她已是再次婚姻，帶著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女兒，在第二次婚姻中又生下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那是沒有避孕工具的年代。她到街道打零工補貼家用，饑餓是家中常態。男人在外地受傷住院使這個家雪上加霜，女人只好去當搬運工，做她所不能勝任的重活，以免孩子們餓死。同情她的青年，是一名母親再婚而他相當於家庭多餘人的文藝氣質的年輕人，他比她小太多把她當姐姐幫助。但物質的貧窮令他不斷幫助她，精神的荒蕪則使他的同情心演變為愛情，男女的愛情產生了後果，私生女成為了不正常生活中不正常感情的見證。當婚姻中的男人歸來，周圍的人包括鄰居都與他結盟，聲討非法男女和女人肚子中的私生子，丈夫有權棒打出軌的妻子，丈夫打，妻子哀求別打死胎兒。丈夫看著妻子的肚子，停住了打。不久胎兒出生了，鄰居們又鼓動丈夫告到法院。作為對非法男女性關係的懲罰。當襁褓中的私生女被視作小賤物扔來扔去，男人看著可憐的女嬰，決定收留，自己做養父。生父被判每月負擔女兒生活費18元。養父雙目變得近乎失明，家中生計全靠母親外出做苦力，養父在家悉心照顧女嬰，並摸索做全家家務，直到女兒成人。

生父，母親婚外情的肇事者，從此不能與女兒相見，每月撫養費通過老母轉給女兒

母親。懷抱愛情和親情的生父，在女兒上學的路上尾隨，只為了看見女兒，滿足情感饑渴。年復一年，女兒習慣了被人尾隨的秘密。直到18歲那年，年復一年的秘密和周圍人冷漠的歧視，令她要母親交出自己身世的由來。可憐的母親安排女兒與父親見面。憤怒的女兒對自己的命運充滿怨恨，不願叫一聲父親，父親用積攢的錢請饑餓的女兒下館子，又給女兒扯藍底白花的布，為終於可以見到成人的女兒而激動。期間，生父由於侵犯他人婚姻家庭的惡名，不能正常結婚，做了農村人家的上門女婿，雖然生育了兩個兒子，夫妻感情冷漠。為養活女兒和家庭，生父城裡活鄉下活樣樣幹，在人們的歧視中辛勞度日。見到成人的女兒後不久，生父重病去世，年僅49歲。

以上對兩位弱勢男性經驗的書寫，呈現了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物質的貧乏和精神的荒蕪，使普遍的人們處於生存弱勢狀態。其次，性別規範的支配力量，深入作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男性的命運同樣受到支配，在弱勢生存處境中，性別規範即婚姻支配的力量，強化了違背婚姻規範的男性的弱勢處境，使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而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適用於普遍女性經驗分析。女性在父權社會的歷史和現實處境，始終是物質上相對男性貧乏，精神上相對男性荒蕪，婚姻體制對她們約束更加嚴酷。因此，對弱勢男性經驗的書寫，促使我們對於女性弱勢經驗的更加深入認識，並從超越男女二元對立的視野，看到大多數男性與女性相通的經驗，把反思重點放在性別制度對人性的束縛上。現代性促成人們對受壓抑經驗和弱勢經驗開發，對男女兩性弱勢經驗的書寫，釋放出兩性對話能量，有助兩性互相理解和共建更合理性別交往關係。

婚姻是父權中心體制的核心細胞，它不同於父權軍事體制專門用於戰爭暴力，通常只在非常時期和特殊場所彰顯存在；婚姻滲透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它甚至是普通人人生的歸宿。婚姻中明確的性別規範體現為人們的生活習慣：孩子隨父姓、子承父志、嚴父慈母，男尊女卑、夫唱婦隨、女子守節等等。婚姻作為生活習慣式的父權體制，只有當人們違反習慣遭遇懲罰時，才能體驗到父權力量的無所不在。生父由於「侵犯」了父權中心婚姻，身被惡名，一生不得幸福，抑鬱而終。養父由於善良接受了「被侵犯」，生活於巨大的心理創傷中，雙目失明更使他失去「男主外」的能力，使他成為「男主內」的倒置角色。這兩位男性從不同角度遭遇了「私生女」這一違背婚姻習慣事實的懲罰。一個男人必須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婚姻不被其他男人侵入，其他男人應該建立自己的婚姻，不得侵入別人的婚姻城堡。婚姻為維護父權中心統治，對男性實行習慣性約束，這一約束內化為男性自律，與男性的人性覺悟相抵觸，從而使男性生活於孤立無助處境。兩位弱勢男性的經驗，凸顯了當男人違背婚姻對男性的規範約束，他們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兩位男性變成弱勢的原因，看似源於物質經濟匱乏和政治權力缺失，然而，他們真正缺乏的是奪取以上權力的能力。他們並非天生不具備能力，他們都勤勞善良，缺乏的是侵犯特徵和支配性進攻欲望。這一父權秘密，也可說是惡的力量，與他們與生俱來的人性善良，具有衝突性質。文本對弱勢男性經驗形成的這一秘密的揭示，正是要喚醒男性對父權及其婚姻制度的反思，這一制度作為男性對女性統治的習慣方式，不僅要求女

人必須守貞，而且也嚴格規範了男人之間的職能，他們被要求成為女人的統治者，不能越界，不能自然表達愛情，不能自然傳遞善良。兩位男性的善良，是他們弱勢的根本原因。善良作為人性遭遇欺壓，反證了父權及其婚姻制度的非人道。

文本通過私生女情節，切入對人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的反思，挖掘了被壓抑的弱勢男性經驗，表達對男性處境和命運的關切。為此，文本深入開發了善良和愛的價值意義，用於抵制無形的惡的力量。經由私生女問題的處理方式，呈現出日常生活中文明與野蠻的無聲較量。養父和生父兩位弱勢男性，在不同的生活空間分別承擔了女兒的撫養責任，盡最大努力付出他們的愛心。他們都沒有歧視私生女，他們都珍視女兒的生命，他們都想方設法讓女兒獲得溫飽和溫暖關懷，雖然女兒並不理解。是他們的努力，在那個隨時會餓死人的時代，「饑餓的女兒」沒有餓死，並在成長中日益領悟到兩位父親愛的珍貴。愛的力量最終戰勝了世俗偏見，使女兒返身關懷兩位父親，她為早逝的生父重建墓地墓碑，向養父掬上心香，感恩他的撫養之情。她最終不僅理解了兩位父親，更深刻理解了男性。愛，無疑是《饑餓的女兒》極力張揚的跨性別的人類精神。

為了集中關注弱勢男性經驗，《饑餓的女兒》還塑造了另一位弱勢男性形象，他是饑餓的女兒的初戀情人歷史老師。作為饑餓的女兒的精神父親，他不同於生父養父之處，在於他不像生父養父都是體力勞動者，他是一位知識份子，作為高中歷史老師，他不僅歷史知識豐富，對時代也非常有見解，同時熱愛文學和音樂，年輕有氣質，是女孩心中的偶像。然而，他仍然是一位弱勢男性，作者要揭示的是，一個物質和精神相對並不缺乏的男性，當他無法與支配性男性力量認同時，他同樣會陷入弱勢處境，這樣的弱勢處境，更加深刻呈現了父權統治的不合理。由於天天看報，看到報上嚴酷的政治鬥爭，歷史老師對於現實懷著清醒的絕望，他深感自己無法融入社會，他也沒有愛的勇氣和能力，他沈浸在強烈的孤獨怯懦之中。他在和「饑餓的女兒」做愛之後，自殺身亡。文本細緻刻畫歷史老師的孤獨怯懦，見證男性弱勢的另一種狀態：他做愛時激烈孤獨的身體、他選擇到廚房上吊的自殺方式、他對女孩身體的撫愛和怯懦安慰。這個能夠與女孩平等對話的歷史老師，處於支配男性群體之外，又無法獲得女性群體的支持，也沒有其他同類男性交流。他的孤獨無助自殺離場，留給女孩的不僅是他贈送的圖書，他遺留的精子，更是弱勢男性無法承擔生命和世界的反思。

《饑餓的女兒》通過三位弱勢男性形象的塑造，不僅反襯了父權勢力無形的力量，而且揭示出大多數男性在處境上，都是潛在的弱勢群體。父權等級制度中，處於高端的支配性力量很少，少數特權支配性男性集團，依靠軍事武裝力量維護他們的統治，使大多數男性處於被支配的依存地位。被支配男性成為從屬的、或者共謀的、邊緣的幾種狀態而存在。如果男性處於經濟政治階層低處，他們不能從屬、共謀，又不甘邊緣，他們唯一的支配對象是女性，婚姻便成為他們支配女性的方式。如果他們未能在婚姻中行使支配權力，如上生父和養父兩位弱勢男性經驗所呈現，那麼，從這些男性身上會體現出與女性類同的處境，也容易與女性經驗共鳴，由於弱勢而產生人性的同情和愛。這正是女性主義特別重視的人道力量和男性愛的精神。積極培育和發展男性的愛的力量，並使

大多數男性從少數男性的支配中獲得解放，正如爭取女性的解放一樣，女性主義是為每個人的愛的哲學。²³

《饑餓的女兒》由女兒的饑餓深入到弱勢男性的饑餓，饑餓在文本中是物質和精神雙重弱勢的象徵，也是作家喚醒男性和女性共同反思父權的策略。

四. 重建男性主體形象

文學女性主義書寫男性失敗經驗和男性弱勢經驗，豐富了我們對於男性形象的認識。但重建男性主體形象的努力，還需要在改造傳統支配型男性形象方面著筆。書寫傳統支配型男性形象受到西方現代父權衝擊所遭遇的複雜情況，反思傳統父權和現代父權的衝突，反思衝突中男性支配氣質所遭遇的壓抑，並引導男性主體成長，文學女性主義呈現出女性主義政治界入父權壁壘的努力和信心。

孟悅、戴錦華曾在她們的《浮出歷史地表》中指出，「五四」一代女作家生活於「中國有史以來罕見的『弑父』時代」，「新文化先驅們旨在廢棄的是文化領域的『帝制』：是那個歷來不可觸動的、超越一切肉身之父的封建『理想之父』：他的禮法、他的人倫、他的道德規範乃至他的話語——構成父權形象的一切象徵」。「五四」時代的英雄主人公是一代逆子，「不僅是弑君的孫中山、忤逆的陳獨秀、不肖的胡適和叛逆的魯迅、李大釗，而且是那些無數反叛家庭、反叛傳統和禮法的父親的兒女們。」²⁴

從拉長的歷史視野和全球化背景看，大中華文學女性主義將「弑父」和「弑父者」，將失勢的父親和逆子們，還原到歷史語境，她們反思西方現代性擴張對中國傳統的顛覆，思考中國現代性發展所需要的男性主體形象，這使得她們遠比「五四」一代女作家成熟老練，脫淨幼稚激情，展現理性審視。張潔的三卷巨制《無字》，嚴歌苓的長篇《媽閣是座城》，前者講述「五四」逆子變成革命者、改革者，骨子裡卻一直充滿父權支配氣質，這一支配氣質製造了男女兩性關係的悲劇，也阻礙了男性現代性主體建構；後者追溯西方現代性競爭機制帶給中國男性深刻影響，提出不平等競爭激發的賭性問題，賭性也是阻礙男性現代性主體建構的困境。二者分別探討了男性主體成長的內因困境和外因困境，儘管沒有提出克服雙重困境的行動良方，卻讓人看到了重建男性主體形象的癥結所在，可見文學女性主義對於父權文化複雜性的清醒認識。

1. 《無字》對父權支配性氣質的反思

如前所述，在康奈爾的男性研究理論中，支配性男性氣質或者說男性氣概，被認為是典型的男人特徵，它建基於性別權力關係即男人對女人的統治，它也建基於生產關係即男人控制財富，使女人陷入貧困和依賴，它還建基於情感關係即女人必須愛上男人，屈從於異性戀的心理控制。就男性從小接受教育和自律要求而言，男性氣質則可以更通俗一點理解為，是指男性應當具有成就取向，對完成任務的關注或行為取向的一系列性

23. 貝爾·胡克斯，沈睿譯：《激情的政治》（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24.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頁。

格和心理特點。²⁵ 也就是說，康奈爾所做的父權制度剖析，具體到每一個制度中的男性而言，他的男性氣質養成實際是表現為生活和生命狀態。它們也是文學作品表現的對象。

《無字》在書寫三代女性悲劇命運的同時，展示了三代男性支配性氣質的演變。可以說，正是男性支配性氣質的演變，使三代女性悲劇命運區別開來，而不是重複同樣的悲劇。饒有意味的是，張潔揭示的三代性別故事，其實是中國現代性演變在性別衝突中的故事演繹。

百年現代性演變，從祖父的男性氣質改變開始：「這個窩在本世紀初石灰窯子裡的業餘獵人兼地主，很奇怪地迷戀上知識」。²⁶ 外祖父葉志清對於現代知識的這種態度取向，竟然是博得外祖母墨荷歡心的唯一原因，使得外祖母從而和經濟上不如娘家的外祖父結成家庭。這與傳統婚姻對男性的經濟需求迥然不同，外祖母放棄傳統習慣的「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乃在於她對外祖父迷戀上知識這一現代男性氣質內涵的崇拜。西方文化對性別故事的界入，就這樣悄然而有力的發生了。外祖父對於西方知識的迷戀不過是一種姿態，現實中他不能使外祖母在物質生活水準上有什麼提高，外祖母甚至羞於帶丈夫或女兒回娘家，她一方面怕自己的境況被娘家人知道，另一方面還怕給丈夫和女兒的心理造成衝擊和負擔。她所承擔的苦果，有著某種理想主義色彩，又呈現為現實的問題，這使她開始審視外祖父的真相，結果發現原來外祖父的文采也並非特別出眾，聘禮上讓外祖母的父親停住腳步尋思的字還是他的父親代寫的。這是外祖母對外祖父男性氣質的解構。也是作家對最早受到西方文化衝擊的中國傳統父權的嘲諷。外來的知識於他們只是皮毛，骨子裡父權思想絲毫沒變，外祖母最終因不能生育男嬰繼承葉家的姓氏而死，仍然是一個傳統女性的悲劇——但由於加入了她對於外祖父想入非非的現代男性氣質想像，更具有悲劇色彩，因為設若沒有這份想像，她會依循傳統嫁給經濟條件更好的男人，也許生活更好一些，未必死得那樣早。從外祖父的角度看，他則得力於迷戀西方知識的姿態，這使他獲得了一點現代資本，在經濟實力不足的條件下，憑藉了這點西方知識的借力，贏得了對於外祖母的駕馭。這無疑是一種寫實的象徵：中國傳統男人必須通過擴張的西方現代性借用，才可以贏得對於女性的婚姻統治。

第二代男人父親顧秋水，不是「五四」「弑父者」，也算不上「逆子」，但可歸入得「逆子」潮流風氣的一代，這個意義上，他更代表了那時代普通的男性。他與母親葉蓮子的相識相愛和結婚，實行的是當時流行的西式的自由戀愛模式。兩個年輕人順利結婚，開始共同生活，彼此學習生活經驗，能夠平等相處，生育了女兒也沒有歧視之嫌。顧秋水的男性氣質可說是溫和的，他不是典型的支配型男性。如果沒有戰爭，他們的小日子會平靜過下去，甚至可能算得上不同於傳統婚姻的新生活。然而，戰爭暴發，年輕的夫妻失去了學習成長的機會，戰爭的恐懼使她需要保護，使他畏懼拖累。事實上，他們完全沒有應對戰爭的能力，這也是一切普通人的命運，反襯的是父權戰爭的非人道。

25. 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頁。

26. 張潔：《無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

戰爭的殘酷打擊普通男性氣質的養成，他們被分出陣容，受到軍事支配，大多數普通男性只能歸屬從屬服從氣質。顧秋水變成典型的從屬氣質男人，他看哪家軍閥能夠讓他追隨，他就死心塌地跟隨，直到被拋棄，他再選擇強勢追隨，最終流落香港，甚至靠侍女阿蘇補貼度日。小說中，女兒吳為稱顧秋水這樣的父親為「癩三男人」，在他身上抽空了父權支配氣質，淪喪了正常人起碼的正義感，從屬性、依附性與他的肉身力量形成強烈反差。這位精神氣質的「癩三男人」，可說是父權戰爭另一種真相的寫照。

但男人顧秋水並非天生如此「癩三」，他也並非希望自己變成「癩三」。他這樣寫信給妻子：「誰讓你死心眼兒，死死地纏住我！把我纏死你也好不了。你不想另求活路，只好兩人一齊死。咱們就泡吧，你也許解恨，我也不想好了！你的思想太舊，太頑固不化，讓你自逃生路你偏不幹，現在我可顧不了你了，這幾天看看不行，我只好同要飯花子一起要飯吃了。為了養大孩子並給她以教育，你應當犧牲自己，就當我死了。」²⁷ 信中暴露了他幼稚的心理，也暴露了他與妻子之間複雜的糾纏，讓我們看到戰爭恐懼讓女人希望得到男人的保護，但同樣處於恐懼的非支配氣質男人承擔不起責任。承擔不起責任的幼稚軟弱男人，反而想像女人應當犧牲自己成全後代。潛意識支配女人的基因此刻復活。這種復活也表現在他抱槍痛哭的時刻，他對槍枝哭喊著「我的兒子」，潛意識強烈渴求支配和強勢力量，回到已被「弑父」的思路慣性，是現代營養貧弱的顧秋水無奈的精神迴旋。顧秋水對已被他拋棄的妻女找到香港找到他，充滿了仇恨，他對她們拳腳相加，他的暴力行為實際是他受壓抑的絕望的總爆發。

從一個溫和平等氣質的普通男人，變成精神「癩三」，照出了父權戰爭的殘酷，也照出了顧秋水這類怯懦的現代幼子，男性氣質營養的嚴重匱乏，他們既斷了傳統父權的基因，又沒法吸取西方男性的養份。他的「幼弱」象徵了新男性成長的貧弱無能，這必然導致中國女性的悲劇。顯然，葉蓮子的悲劇是不同於上代女性的悲劇，她的被拋棄、無可依賴，是徹底的無望於男性。葉蓮子必須要獨立承擔起自己和女兒的命運。她用漫長的一生做到了這點。在這個意義上，葉蓮子最終成長為獨立的女人，她付出了沉重代價，也擺脫了對父權的妄想。在與男性分離而獨立成長的過程，葉蓮子和吳為形成母女共同體，戰勝了生存艱苦和恐懼，也開發了女性成長潛能。她們則又象徵了中國現代女性獨立成長的艱難歷程。進一步而言，這也使得中國女性在精神獨立上，擁有審視傳統中國父權和西方現代父權的雙重能耐，因為西方現代性擴張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戰爭，成全了她們對於雙重父權的批判視野。

《無字》的深刻之處，還在於對第三代男人即長篇的男主人公胡秉宸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多重反思。小說女主人公吳為經歷了對胡秉宸由愛而恨的心路歷程，她對胡秉宸支配性男性氣質由迷戀到批判、由認同到反對的認知過程，反映了作者對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反思深度。

僅比吳為父親顧秋水年輕數歲的胡秉宸，是一位真正的「五四」逆子，他背叛他的

27. 同上，第390頁。

顯赫家族投身革命，孜孜以求，從優異的學習到赴延安尋找革命，從革命成功到榮獲京城要職，從受政治迫害而不消沈到復出之後投身改革，取用康奈爾的典型男性氣質或者說男性氣概來衡量，無疑是一位精準的男性氣質自律者。這也是他強大的魅力、領導力所在。他對於所從事革命和改革事業的成就取向，自認為是歷史使命，這也是他言辭話語的集中指向，是他關注點所在，是他行為取向趨力。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確證卻並不是由事業來圓滿完成。

換而言之，革命成功，改革進行，他卻不能停留在革命和改革本身確證男性氣質，他需要對女性進行征服。他的征服方式是饒有意義的，戰友白帆成為他的妻子，他卻揭發她有外遇有私生子，他拋棄她，追求吳為。獲得吳為之後，與吳為之間展開了書寫各自自傳的競賽，此過程他顯然輸於作家吳為，他又回頭找白帆，想以拋棄的方式贏吳為。征服複數的女人，這一潛在欲望和控制策略，遭遇兩位女性不停的反抗，他想游刃自如而不得，最終敗於生命大限。

《無字》首先反思了「他那個階級的精品人物」胡秉宸在男性主體建構上的努力。這一努力是現代性追求的自覺，早期表現於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後期表現為積極改革，他的選擇基於「民族國家進步」，將個體的價值與族群價值、人類價值匯通，這是一種主體人格成長的選擇，如巴赫金所指出，現代「人的成長帶有另一種性質。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與世界一同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²⁸ 但胡秉宸對自己的這種成長日益不再自信，或者說，這一男性主體建構，放在全球日新月異的現代進程，他日益無法評估其獨立的價值。他的階級所充滿的自我質疑，鬥爭和分裂，也反映在他的自我矛盾中。他一直堅持寫自傳，卻無法完成他的自傳，這一事實，象徵了他的主體建構的被解構。如此，一位中國精英男性的努力，再現了人類現代性追求的某種悖論。其次，《無字》反思了胡秉宸控制女人的種種策略，類似特工情報的書信往來、類似心理戰術的吻，甚至類似太公釣魚的引誘。作者旨在對異性戀統治進行性政治分解，這樣的反思無疑超出了胡秉宸和吳為兩位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恩怨，強化了文本的女性主義姿態。第三，《無字》揭露了中國精英男性在現代性價值虛無之際，試圖通過強化對女性的統治來保持男性支配性氣質。胡秉宸在戰爭期間與白帆結為戰友夫妻，總體上是平等相處的。但改革之後，他一方面遭遇大權失落，另一方面對世界形勢變化日益有了危機感，他對於吳為的需要，在於吳為這位優雅的女作家擁有話語權，於是，他用盡種種策略征服吳為。得到吳為之後，他實際上想同時控制吳為和白帆兩位女性，他試圖證明自己高超的駕馭能力。此時的胡秉宸，演變成傳統中國父權式男性，其父權支配意志的強大，與他無法支配兩位女性之間構成強烈反差。

吳為對胡秉宸的男性主體建構努力的欣賞和迷戀，與她對他父權支配意志的憎惡與仇恨，形成兩極對立的感情，這種分裂導致吳為最後發瘋。「吳為在瘋狂中看到一個頭戴紗帽、身穿朝服的男子走了進來。那男子的臉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無，只

28. 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

光板一張。光板上縱橫地刻滿隸書，每筆每畫闊深如一位線香，且邊緣翻卷。」²⁹ 這一形象可說是對傳統中國父權支配氣質作出的籠統的畫像。

《無字》文本對中國現代男性支配氣質深刻反思的啟示：一方面，中國男性需要建構現代主體性；另一方面，這一主體性必須中止演變為父權支配氣質。

2. 《媽閣是座城》對競爭賭性的反思

相比嚴歌苓其他作品，《媽閣是座城》在語言敘事藝術上甚至可說是不夠從容，但就探討競爭賭性這一原創主題而言，這部作品再次體現了嚴歌苓的創造力。傑佛瑞·弗里登指出：競爭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本質。競爭和威脅是相關的存在。³⁰ 史蒂夫·比達爾夫則揭露道：「競爭是現代資本主義導致的一種個人生活品格，它起源於人們強迫自己尋找那些永遠不可能得到的讚賞。他甚至認為競爭心理是男人生活的毒藥。」³¹ 他們都看到了現代競爭與現代男性支配氣質之間深刻的淵源。

如何書寫現代競爭，這一構成現代男性支配性氣質的關鍵因素，對於文學女性主義來說無疑是個挑戰。東方或者說中國男性與西方資本主義相遇，實際是與競爭對手相逢，如何塑造受到競爭衝擊的中國男性形象，意味著對於中國男性處境深刻理解和闡釋，也意味著對中國女性複雜處境的全面認識。

《媽閣是座城》選擇澳門賭場為題材，這無疑具有強烈象徵性。澳門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橋頭堡，也可說是中西方文明競爭的第一個平臺，這裡如今是世界最大的賭場，雖然世界各地賭客都有，但更多的賭客來自中國，他們中絕對多數是經濟上的成功者，絕對多數是具有競爭精神而且不怕輸，具有競爭賭性氣質的男人。嚴歌苓甚至把小說的第四卷的直接命名為〈東方男人身上都流有賭性〉，這個命名點明瞭她小說探討東方或者說中國男性現代賭性氣質的主題。

小說的「引子」回顧中國男性與西方男性相遇的百年歷史，上溯梅家五代的男人故事，探究中國男性現代賭性的由來。梅大榕「出洋去番邦淘金沙」，他和村裡許多其他男人一樣，離開自己祖輩熟悉的土地和農活，去美國做勞工賺錢，全球資本主義將他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模樣。他們的辛勞、他們的傷痛無人問津，就像嚴歌苓《扶桑》中所寫，有人死在歧視的皮鞭下，有人死在過度勞累中，而他們賺的血汗錢積攢了，才能回家娶媳婦。他們中大多數人把賺的錢投向了賭桌，要麼贏得更多，要麼輸精光，手中的錢讓他們覺得不過癮。資本主義的金錢奇跡令他們以生命為賭，許多人輸了就投海，梅大榕最後也成為其中的一個。

顯然，賭性歷史的追溯證明，所謂「東方男人身上都流有賭性」，源於他們受到一種極不公平現代競爭的衝擊，他們捨命而博弈，沒有前景，全靠運氣，試圖贏回注定難

29. 張潔：《無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

30. (美)傑佛瑞·弗里登，楊宇光等譯：《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頁。

31. (澳大利亞)史蒂夫·比達爾夫，石新輝譯：《男性的品格》（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頁。

以贏得的成功和尊嚴。就此意義而言，文本的引子，是這部小說最重要也最精彩的部分，就寫作技巧和語言而言，也如此。「引子」不僅寫出中國男性百年遭遇的衝擊，而且寫出了女人面對男人如此遭遇之際，做出的果斷強勢反應，梅家媳婦梅吳娘一反傳統婦道，一次又一次溺死男嬰，只讓女孩存活，她看到現代性競爭中女性的優勢，她本人也極大發揮出自己的潛力，將桑蠶業投入市場，贏得了經濟成功，也贏得了在梅家的地位和威望。正是她的努力，梅家留下的女性一脈，既懂得賭性，又最後引導賭性向創造性轉型，小說的結尾，梅家第五代女子梅曉鷗，引導賭性藝術家史奇瀾回歸創造性，摒棄賭性。無論從小說人物名字的象徵性——史奇瀾象徵中國歷史的波折，梅曉鷗象徵對現代資本主義骯髒一面的深刻洞透，就如她自己所說，她知道漂亮飛翔的海鷗，吃的都是最骯髒的垃圾。

文本中，嚴歌苓借梅大榕一次投賭大贏後成家生子，在家鄉重新過上富足的農業文明生活卻內心並不滿足，來揭示資本主義現代性對人類生命意識的改變：「梅大榕於是被鄉裡鄉親當成了王。背朝天面朝地做苦力掙來的房屋田畝算什麼？了不得的人都是一眨眼掉進錢堆的。……看著桑林一片片擴大，綠了又枯，枯了又綠，看著桑蠶漸漸肥了，做出繭子，變成蛾子，輪回往返再三，同時也看著梅吳娘生下一個因再生下一因，看得他日日哈欠連天，懊惱自己一筒煙工夫得來的錢怎麼去得如此艱難滯慢，還想不通在船上錢來時那樣石破天驚，而錢去時竟跟億萬眾生毫無二致：戰戰兢兢無聲無色。」³²

這段文字讓我們看到巴赫金所說的「時間進入了人的內部，進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³³ 強烈的時間意識使梅大榕無法再回到傳統父權支配氣質，他喪失了那種篤定的信心，對於支配的意義發生了動搖。他被現代性所吸引，但並不明白由來和結果，他強烈渴望改變自己，但他並不知道改變之後應該重建，就像他贏得金子又重新回到原來生活軌道並不令他滿足，他只能投身到不斷的賭中，才能反復體驗時間斷裂的強度，感受現代強烈的刺激。這種可怕的賭性，是東方或者說中國男性對於現代性的回應，是一種強烈的東方後發現代性心理反映，源於東方男性的強勢父權支配心理受到衝擊，無法適應和調整的艱難，也是一種逃避受傷心理的反映。時間性給予他們可怕的打擊，永恆感和安全感同時淪喪，賭性，作為一種極不安全心理的見證，揭示了西方現代性擴張帶給東方文化的負面影響。這是一種以瞬間的空間行為，要贏得時間積累成果的競爭性爆發。這是東方或者中國男性與西方男性相遇之後，直觀產生的支配性氣質不服輸的反擊特徵。無疑，這也是一種極具自傷的行為和男性支配氣質的總和。

嚴歌苓在《媽閣是座城》中，將清華高材生、風度翩翩的北京大房地產商段凱文，充滿藝術天賦和想像力的木雕藝術家史奇瀾，和前國家科研機構幹部盧晉桐這三位具有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男人，分別安排在不同的賭桌和賭局中，但卻共同展示了他們強烈的賭性，一種不服輸而最終自傷的男性氣質。文本中多次特意寫到他們賭博到極致，身體

32.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初版），第6頁。

33. 巴赫金：《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發出不同於男性荷爾蒙的強烈變質氣味，象徵著他們的賭性是他們男性氣質變質的表現，並暗寓作家對中國男性氣質前途的擔憂和關心。這種擔憂和關心推動著小說的故事情節，由驚心動魄賭場轉移到事業和家庭空間，各種傷害不斷展示，而傷得最重的仍然是男人自身，段凱文失房產、史奇瀾失家庭、盧晉桐陷入絕症。文本最後借女主人公梅曉鷗的思考，她反復想像一雙賭博翻牌之手，如何一次次演變為一雙鋼琴演奏、藝術雕刻的藝術創新之手，表達作者對男性氣質正面建構的期待。

在女性主義的理想中，男性主體形象和女性主體形象一樣，是雙性氣質可以轉換、性別關係可以置換，是能夠平等對話的生物多樣性的形象，「不管男人還是婦女都有採取許多種不同行為的生物學潛能。」³⁴ 做「天性健全自然的男人」，³⁵ 從統治支配型氣質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是文學女性主義重建男性主體形象的努力。《無字》和《媽閣是座城》呈現了文學女性主義實績，它們對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多重反思，拓展了對人類現代性問題的思考。

五. 女人和男人的對話

女人和男人對話並非易事。父權體制中女人沒有話語權。女性主義一直努力爭取女性的發聲。改變「人輕言微」的局面，可以理解為對女性主義政治通俗的闡釋。女性主義者充分意識到話語權的難度，一方面「女人」和「女性」「在教育和習俗的現狀中」；³⁶ 另一方面「男人」和「男性」亦「在教育和習俗的現狀中」，展開女人和男人的對話，既要從現實現狀出發，又要呈現新的教育和新的習俗的可能性，讓人們相信「在走完男性統治的血腥的歷史彎路之後，婦女和男人最終都將發現人類潛在的意義。」³⁷

針對男性經驗和男性氣質的發言，文學女性主義採用了切實可行的現實政治策略，女人和男人的對話主要從「在教育和習俗的現狀中」三種情感關係出發：一種是現實的父女關係；一種是現實的母子關係；一種是男女之間的情愛關係。這三種關係概括了女人和男人之間主要的情感紐帶。傳統父權體制將這三種情感關係扭曲成「三從」統治模式，³⁸ 要求女人：從父、從子、從夫。「三從」的後果，勢必形成女人對於男人強烈的身心依附，離開男人她們必深感沒有安全感。「三從」統治模式導致男人的處境則必然是：男人必須做強者、「大丈夫」，無止境追求成功，形成剛強的男子漢氣概，把生命的脆弱和內心的軟弱視為可恥。這無疑使男人遠離他們的生命真實體驗，使男人無法向女人顯露他們的怯弱和真情。

現代以來，「三從」的枷鎖已被打開，但重建三種情感的平等對話模式，卻需要對

34. (美)理安·艾斯勒，程志民譯：《聖杯與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35. (澳大利亞)史蒂夫·比達爾夫，石新輝譯：《男性的品格》(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

3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鐵柱譯：《第二性》(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27頁。

37. (美)理安·艾斯勒，程志民譯：《聖杯與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頁。

38. 《儀禮·喪服·子夏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歷史進行清理，並需要從女人和男人的正常情感需要中提取經驗資源。這正是文學女性主義女人和男人對話的意義所在。

1. 重建父女關係的對話

現實中的父女關係包括生父與女兒的血緣關係、養父與女兒的養育關係、精神之父與女兒的教育關係。通常生父在世，很少女兒體驗到養父的關係。作為教育影響力的精神之父，則是現代女性有機會接受教育的背景下產生。

虹影《饑餓的女兒》文本，可說是一石三鳥，集中講述了女兒與生父、養父和精神之父三位父親的故事。從獲得愛的精神角度，「饑餓」時代反而讓三位男性用「愛」反哺了「饑餓的女兒」，他們沒有歧視她，竭盡「弱勢男性」的所能，他們養育和培養了她。然而，在「饑餓的女兒」成長過程，她所深刻感覺的「饑餓」，並不僅是物質饑餓，恰恰是「缺父」的饑餓。另一方面，三位父親儘管真摯深愛「饑餓的女兒」，卻也時時深感自責。文本在女兒尋父、辨父，和悼父的展開中，讓我們看到了人物內心深刻的糾結，而糾結的核心，可說是無法對話溝通，彼此的深愛，無法形成對話流動的能量，相反變成傷人和自傷的力量。文本深刻地揭示了「在教育和習俗的現狀中」，「從父」的力量是如何阻礙了父女之間正常情感對話，從而造成了人物之間無法彌補的痛苦。

首先，女兒所尋找之父，源於她所渴求的強勢保護力量，是她潛意識的「從父」。這使她即使面對自己的生父，她打心眼裡也不想相認，也不稱呼父親。而養育她的養父，她雖然感恩，卻也止於感恩，並無更多溝通的願望。這也是她陷入對歷史老師即精神之父早戀的原因。然而當歷史老師也不承擔與她相愛的責任，自殺離世時，她對他由愛變恨，恨他不負責任。文本對「饑餓的女兒」「缺父」饑餓症的深刻揭示，反思了「從父」慣性對女兒的深刻影響，正是女性對強勢男性的渴望，使女性陷入真正的精神饑餓，看不到現實生活中「真正的父親」。這一切強化了女兒的悲劇感，更加深了三位父親的悲劇，他們的弱勢顯得更加貧弱。文本實際上揭露了父權力量通過情感模式，對女性和男性雙重傷害，甚至對於男性傷害更大。

其次，生父和養父內心承受「從父」壓力，使他們無法主動與女兒交流愛的感情。他們都是弱勢男性，時刻感覺自己無力給子女兒強大的依靠，他們竭盡全能所予，女兒於他們仍是「不從」，既不叫一聲父親，也不聽從父親。由於他們都受到內心更強大父親形象自律的自責，不配做父親的自卑令他們生活壓抑。這種自責自卑也是生父早逝的原因。歷史老師作為精神之父，他也深覺自己的愛即是罪，原因在於他無法在神聖的父愛與性愛之間找到平衡，他只能自我定罪。三位男性都不能用真實的生命體驗與女兒交流，無法贏得女兒的理解，他們對於自我生命情感的壓抑，讓我們看到男性生存的真相。可以說，他們生存於「被要求」的強勢男性陰影之下，他們把這種被要求內心化，現實卻永遠達不到，他們無聲的掙扎於分裂的自我與他者之間。

《饑餓的女兒》所展開的父女對話，建基於父女對話未曾實現的情感精神「饑餓」荒原。成人之後的女兒，反覆辨析自己生命的由來，發現三位父親於成長的意義，從反

思的角度剖析「父親失真」的原因，尋找「父女關係真相」，在悼念三位父親生命的同時，構築「真實父親形象」，他們的怯弱、善良、真摯愛心，成就了「饑餓的女兒」思想成長，讓我們看到重建父女關係對話的人道價值。

一種沒有實現的對話，一場「饑餓的女兒」發出的反省，是女性主義對話的籲請。《饑餓的女兒》對於父女之愛的正本清源，意味著重建父女關係對話的可能。

2. 重建母子關係的對話

儘管受到「從子」的約束，母子關係相比「從父」的父女關係，仍然很不同。一方面母子情感孕育於十月懷胎，漫長的嬰兒時期兒子在實際的意義上是「從母」，象徵意義的「從子」則賦予母親權威性，因母親生育兒子是為父系傳承，「母言」也由此擁有一定威望。母子情深一向受到中國文學吟詠，在孟郊名作《遊子吟》中，「從子」的複雜性和母子情深的豐富性可見一斑：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唐詩三百首》中這首家喻戶曉的慈母頌歌，題下作者自注「迎母漂上作」，此時孟郊五十歲，位溧陽縣尉，這一當時卑微的職位，於「遊子」孟郊而言，已是他汲汲功名的成果，也是他作為兒子可以告慰於母親的成績。在父權體制中身為男人就得為功名奔波，以實現男人的價值。此處的「遊子」是從母親角度想像兒子，正因為從母親角度擬想，才能體會母親不忍兒子奔波，盼望兒子早歸的心情。「從子」的母親當然無法阻擋兒子遠行。「手中線」和「身上衣」之間的張力，「密密縫」盼望「遊子」平安歸的母愛，正是父權體制下無奈母親的操心、惦念和憂傷。

「遊子」遊於科舉和功名，競爭目標和前景可見，就像作者在另一首名作〈登科後〉所寫「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此時「母憑子貴」和「夫貴妻榮」一樣，是父權等級對於男性氣質及支持者的嘉獎。但如果「遊子」是遊於戰功，情況就很難預料，「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李白五言詩)這樣的情形，是「密密縫」的母親「意恐遲遲歸」的真正恐懼，無論何種嘉獎都無法與愛子的生命相比。但生命價值這一源於母親的價值立場，在父權價值系統是被戰功所取代而罔顧母親感受的。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直接切入母子關係中，母親只能沉默承受的戰爭離散情感。文本述寫國共內戰，博涉世界大戰，作為大中華語境的書寫，其文本創意卻立足於「慈母」「遊子」這一傳統母子情感結構。全書70多個戰爭故事，均由「慈母」龍應台與正值服役年齡，將要成為「遊子」的兒子飛力普娓娓細述，細節之動人，情感之深摯，可用「密密縫」來比喻。所不同者，孟郊詩中的慈母是真實的針線，龍應台是用歷史的針線，前者只能令遊子難以忘懷，後者卻要讓遊子改變選擇。女性主義智慧的策略，將話語權力通過情感滲透，達到與兒子真正對話交流的目的。

為了展開這一史所未有過的「母子對話」，在文本之首，作者有意製造了兒子對於母親傾聽的需要：「我真的沒有想到，飛力普，你是認真的。」

作者以滿懷驚喜甚至感恩之心，面對19歲的混血兒子，當他把答錄機架好，把迷你麥克風夾在龍應台的白色衣領上，要傾聽母親講述自己的歷史，龍應台不禁浮想聯翩，反思自己從未曾關心父母的歷史，事實是，自己和父母的歷史從未曾被需要被關心。兒子的認真和關心，打開了塵封的歷史大門，洞開了時間隧道。

「我開始思索：歷史走到了二〇〇九年，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那麼青春無邪的人，我要怎麼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不再是那個「意恐遲遲歸」的古典母親，這位「愛的責任」承擔者、歷史的講述者，要表達的是女性主義對於男性命運的擔心、關心，進而表達堅定的反立場。

《大江大海》充滿殘酷血腥的戰爭文本，是母親引導兒子對歷史的另類考察，母親和兒子一起落淚，一起探討，一起反思，這一考察歷史的過程，也是母親引導兒子成長和超越的過程。在此過程，龍應台不斷讓母子對話出現在故事之間，從而使對話穿越歷史，連接互古，呈現出女性講述歷史的空間特徵。

空間特徵也是對話文本特徵，它要平等呈現不同的對話者及其不同的經驗。母子之間的對話以開放的空間為兒子的成長選擇提供了可能。也為母親的自我超越提供了可能。《大江大海》標示了重建母子關係的價值。

3. 重建男女情愛關係的對話

在西方女性主義看來，異性戀是「對性欲的二元化管控，壓制了某種干擾異性戀、生殖與醫學司法霸權的性欲形式的顛覆多元性。」³⁹ 中國傳統父權文化下的異性戀婚戀更複雜，在強勢男性集團中，多妻制合法存在，同性戀也並不排斥。性慾管控單方面針對女性，「從夫」是基本的管控模式。事實上，一個男人管控多位女性並要求她們服從，是傳統父權文化異性戀常態。

現代以來受西風影響，法律婚姻形式上的多妻制度已消除，但傳統父權文化影響下的強勢男性，一個人管控或駕馭多位女性的異性戀情感模式，仍然存在於中國現實生活中。文學女性主義深刻揭示中國現實生活的這一獨特性政治，努力於複雜中探討重建男女情愛關係的對話。

如果說張潔的《無字》失望於現代男性骨子裡的父權本質，對於胡秉宸這樣一個男人操控吳為和白帆二位女性，感到噁心，因之「無字」，無法與之對話。那麼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則有意深入駕馭多位女性的男性生活，從中發現性政治與情愛之間狹小的通道，試圖讓被駕馭的女性獲得主體性，從而實現與男性的對話，瓦解其性政治管控。

在此意義上，《媽閣是座城》不僅探討東方男性的賭性，也探討這一賭性與性政治的關聯，對於多位女性的駕馭，恰如他們無法駕馭自身命運的賭博，是一種不甘失敗的男性氣質的表現。小說塑造了被男性作為多位女性控管對象之一的梅曉鷗形象，她從一

39. (美)裘蒂斯·巴特勒，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6頁。

位寄生蟲一樣的被男性包養的女性，成長為一位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女性，最終擺脫賭場和情場，懂得情愛對話的美好，贏得人生的新前景。

小說的女主人公梅曉鷗，首先是北京電子企業老闆盧晉桐包養的情婦，她才18歲，父母生活中各自出現的第三者令她心累，她懶得思考，自己眨眼卻成了憎惡的同類人。年輕的她無法也懶得擺脫盧晉桐物質供養和情感控制。盧晉桐把她送到美國，以與他北京的婚姻隔離，實則是他的另一個婚姻。盧晉桐每當出差或者度假到美國，就把梅曉鷗帶到拉斯維加賭場。梅曉鷗懷孕了，她要求盧晉桐戒賭，盧晉桐斷指發誓，等兒子生下來，他卻賭癮復犯，最終輸空，把梅曉鷗和兒子都轉讓給姓尚的上海男人，由這個男人把他們送到媽閣賭場。在媽閣賭場，梅曉鷗用出賣青春給尚姓老闆得到的十萬美金，養活兒子，租住房，並開始自己的女疊碼仔生涯。

小說用了強烈的象徵手法書寫梅曉鷗與男性性政治之間的較量，男人們在檯面上互相賭搏，在台下則是與她暗中賭搏。她作為女疊碼，用色相和心理引誘使男人們下賭，也使自己不斷陷入和不同男人之間的較量。正如文本中反覆寫她對女色、男色的掂量，她深知男女交往中曖昧即情色資本交換與較量的政治。這一切使她賺取了金錢，也使她看清了自己和男人們的處境。這樣的處境使她疲倦和厭倦。正是極度的厭倦促成她思考和渴望新的生活。她曾經將一見鍾情的雕刻藝術家史奇瀾引入賭博，從他那兒賺取更多金錢；思考使她悔恨，她決定幫助他戒賭；她甚至用自己的錢和房子幫助他。最終她發現，只有愛情能夠使他平靜，而也只有愛情，能夠使她自己昇華。他們發展了毫無控制對方意志的純粹唯美的愛情，在愛情中，史奇瀾重新變成了藝術家。在愛情中，梅曉鷗變為別人著想，愛的博大豐富了她的精神。當他們為了史奇瀾的家庭分手的時候，梅曉鷗發現愛情並沒有因此離開自己。她已經具備了愛人的能力。她決定帶著兒子離開媽閣，到史奇瀾所在的加拿大，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

《媽閣是座城》穿越了東方父權文化受到西方現代性衝擊之後，遭遇的種種扭曲，用小說故事發展和人物成長方式，向我們呈現了男女情愛對話的可能。「男性統治的精神浸透著內心衝突、緊張和恐懼。但是，當我們從男性統治向男女合作前進時，我們便愈發能夠開始從防衛向成長運動。而且正如馬斯洛在研究自我實現的和創造性的人時所觀察到的那樣，當這種過程發生時，我們並沒有變得更自私和更以自我為中心，而是將日益向一種不同的現實——我們和全人類本質上相互關聯的『最高經驗』意識——前進。」⁴⁰

文學女性主義重建男性經驗與男性形象的政治策略，從失敗男性經驗、弱勢男性經驗和強勢男性形象分析出發，回到與男性對話的目標，意在重構文明形態，豐富人類自我認知，不僅有助女性解放，也非常有助男性解放，同時無疑極大豐富了文學的內涵和形式。 □

40. (美)理安·艾斯勒，程志民譯：《聖杯與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頁。